

《李自成》讨论集

武汉师范学院

一九七八年四月

目 录

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战争历史画卷

——读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二卷

.....古 平 (1)

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二

卷.....冯天瑜 (27)

“深入历史”和“跳出历史”

——谈李自成形象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张园道、李悔吾 (50)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浅谈《李自成》第二卷人民群众

形象的成功描写.....阳涛平、洪 和 (81)

一位光彩照人的巾帼英雄

——高夫人形象的塑造.....李悔吾 (90)

浅谈张献忠形象的塑造.....周颐厚、黎敏茜 (103)

深刻的反面典型，成功的艺术塑造

——试论《李自成》一、二卷中的崇祯

.....王 毅 (118)

妙手丹青落笔细，金针绣象摄魂深

——谈《李自成》的细节描写.....熊德彪 (134)

诗歌的艺术形式与小说的人物塑造

——《李自成》民族风格管窥一得.....杨建文 (147)

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战争历史画卷

——读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二卷

古 平

姚雪垠同志精心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和修订后的第一卷的相继出版，是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倒“四人邦”，文艺得解放的胜利成果，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可喜收获，它给在华主席领导下粉碎“四人邦”后的文艺百花园地增添了异彩。

《李自成》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期待下创作的，是在毛主席文艺思想指引下创作的。毛主席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特别是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有过高度的评价。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我国历史上二十几次大规模农民革命战争中最著名的一次。对创作反映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题材的文艺作品（如京剧《逼上梁山》），特别对创作以李自成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毛主席一贯很重视，认为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处理这样的题材，将会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但是，毛主席的有关这方面的重要指示，由于受到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邦”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干扰、破坏，一直没有得到认真贯彻，以至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长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块空

白。一九六三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姚雪垠同志创作的《李自成》第一卷，毛主席很高兴，并关心以后几卷的创作，为此作了指示。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热情鼓励下，作者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和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的崇高愿望，多年来不分寒暑，争分夺秒，刻苦写作，终于在一九七三年完成了第二卷的初稿。但在“四人邦”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高压下，作者却无法进行修改，作品更不能出版。尤其令人忿慨的是，当作者于一九七五年写信给毛主席，并得到毛主席的又一次关怀，及时作了批示时，“四人邦”的狗头军师张春桥竟然进行抵制和破坏。在有人知道毛主席有这个批示之后，张春桥才不得不对有关方面随便提了一句，但对毛主席批示的原文仍严密封锁。

但是，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的光辉。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给了作者以无穷的力量。在“四人邦”横行的日子里，作者顶住逆流，决不以自己的创作去迎合“四人邦”的口味，决不按“四人邦”的“三突出”和“儒法斗争”的框框，去歪曲农民革命的历史和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正如作者在一首诗中所表白的那样：“十年寂寞蓬窗女，羞学江家时样妆。”他坚决遵循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毛主席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教导，认真地进行修改，以创作实践批判“四人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和文艺观。也正因为这样，这两卷小说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认真分析这部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总结其创作经验，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而且对在文艺领域中深入揭批“四人邦”，肃清其流毒影响，也有现实的战斗意义。

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处理农民

起义的重大题材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历史壮举。这次起义，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朱明王朝的罪恶统治。李自成牺牲后，他的部下又坚持了将近二十年的抗清斗争。这次起义，不仅时间长，规模大，斗争曲折，影响深远，而且由于它爆发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出现在资本主义已经萌芽的时代，既继承了前代农民起义的传统，同时又有新的发展，新的特点。在起义过程中，曾产生了大量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农民领袖，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崇高的革命品质和英雄气概，为我国的农民革命战争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以明末农民大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深刻反映当时农民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两个阶级的生死大搏斗，反映当时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反映当时各个阶级、阶层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不同的社会生活，并突出反映当时各派政治力量、军事力量之间的联合和斗争，以十分广阔的画面来展示封建社会的面貌，再现历史的真实。显而易见，《李自成》不仅将成为一部气壮山河的农民革命战争的史诗，而且从它所反映的十分广阔的生活画面来看，它也将成为一部展现封建社会全貌的百科全书。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的规划，作者准备用五

卷（共三百万字）巨大篇幅，来描写这次农民战争的全过程。现在出版的一、二两卷，虽然只写了崇祯十一年十月至崇祯十四年二月间的斗争历史，但包括了两个阶段，即革命的低潮阶段和革命的转变阶段，同时追溯了崇祯十一年十月前发生的许多事情，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和当时阶级斗争的规律，总结了农民革命的一些重要经验。

作为历史小说《李自成》突出的成就是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反映历史，深入揭示历史的本质。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作者按照毛主席教导，唾弃了“四人帮”的“法家路线决定一切”的谬论，把《李自成》写成了一部形象的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史。

这部形象的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史，深刻地揭露了明末社会的黑暗，揭露了以崇祯为总头子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及其他劳苦群众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反映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背景。小说揭露的锋芒，从皇帝、藩王、文武大臣、宦官头目、乡绅大户一直到庄头、蠹吏、邦闲、狗腿，把这批吸血鬼、害人虫的丑恶面目和腐朽生活，展示在读者面前，让人们看到封建主义这个毒瘤已临近最后溃决，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同时，作者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描写了当时劳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和不幸遭迁。白鸣鹤、邵时信、红娘子的血泪控诉，就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当时“人心思变”、“官逼民反”的阶级

动向，看到明末农民起义的深广的社会基础。白鸣鹤是典型的农民，邵时信是破产了的小商贩，红娘子是卖艺的“绳妓”，他们职业不同，但都有一本血泪斑斑的家史，都是被封建地主阶级逼得走投无路，才决心造反的。由于各阶层参加起义，形成了以革命农民为核心的浩浩荡荡的起义大军，把反封建的斗争推向了历史的新阶段。随着斗争的深入，不仅参加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包括的阶层也越来越广泛。进入河南后，河南的饥民、伏牛山的矿工都闻风而起，地主阶级内部也开始分化。连举人牛金星、贵公子李岩也联袂而至，这就说明反动派更加孤立，农民起义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李自成》写的“官逼民反”和《水浒》的“官逼民反”不同：《李自成》写的是一些阶级、阶层的动向，被逼的不是个别人，而是广大劳苦大众，逼他们的不是个别贪官，而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所以矛头对准以崇祯为头子的地主阶级和他所代表的封建政权；《水浒》关心的是个别人物的命运，逼他的是少数贪官，而天子倒是“圣明之主”，所以它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两者的不同，一方面说明李自成领导的起义较之以往的农民起义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方面说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反映历史，才能正确地处理农民起义这样的重大题材。《李自成》成功的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

《李自成》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十分深刻，但不停留在对封建社会的揭露上，而是为了说明：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为了表达这个主题，两卷小说把一系列武装斗争的场面写得惊心动魄，波澜壮阔，显示了势如暴风骤雨的农民革命战争的浩大声势和巨

大威力。如潼关南原大战、商洛山保卫战、强渡汉水、星驰渭南、挺进伏牛山，都写得有声有色，使人感到这是一股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即使遭到重重阻碍，不得不迂回曲折，但总是奔腾向前，总是在不断积蓄力量。“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到了河南，就如水出龙门，一泻千里，敌人设置的堤防被摧毁得七零八落，明朝的地方政权被打得落花流水，接连杀了明朝的两个藩王，第一次打下了象洛阳这样大的城市，为劳苦大众迎来了盛大的革命节日。农民起义军这沉重的一击，“打在崇祯要害的地方，打得他闪腰岔气，眼冒金花，打得杨嗣昌晕头转向，使他全盘棋势都要打乱，连着亏炮折车”（注）。杨嗣昌终于自杀了，崇祯则被“围困”在紫禁城中，一筹莫展，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纵管他仍然自欺欺人，号称“中兴圣主”，其实亡国的阴影时时笼罩在他的心头。《李自成》通过对崇祯的描写，不仅反衬出农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而且把这个泥足巨人放在生气勃勃的农民英雄的高大形象前面，使人们看清到底谁配做历史的主人，谁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李自成》不仅显示了农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而且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在商洛山时期，李自成领导的这支农民军就代表劳动群众的利益，向地主阶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进入河南以后，反封建的旗帜举得更高，推翻朱明王朝、建立新政权的意志更坚强。义军所到之处，地主、豪绅、官府、藩王威信扫地，劳苦大众扬眉吐气；封建的旧秩序受到沉重打击，明朝的地方政权土崩瓦解，成了农

注：引自《李自成》。下文不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书。

民军的天下；封建的意识形态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吕维祺这样名声很大的假道学成了审判和镇压对象；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虽然没有从根本上铲除，但豪强兼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农民军的革命行动和这种行动产生的影响，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亡过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李自成》形象地阐明了这一真理，给了诬蔑和贬低农民起义的“四人帮”以当头一棒。“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而任意篡改历史，他们胡说什么，农民起义往往客观上为法家路线的推行或法家思想的继续传播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甚至还说，法家是农民的代言人。他们把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这个“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贬低为法家的“清道夫”，把农民起义从属于“法家”政治，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大暴露。

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

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塑造了李自成这个农民革命领导以及其它众多的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这是《李自成》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

《李自成》中的一些主要人物，不仅是历史上实有的，而且这些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也大体上与原型符合和近似，但作者没有被历史记载所局限，而是沉于历史，高于历史。根

据艺术典型塑造的需要和历史的真实性，通过对生活的概括提炼，虚构了许多故事情节，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使这些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比实际生活更丰满、更理想、更典型化。

小说集中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英雄形象。在一、二卷中只写了革命低潮时期和革命转变时期的李自成，但都深刻展示了他成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历史环境，表现了他作为杰出农民领袖的高贵品质和卓越才能。

我们在小说中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历了十年革命战争的考验，有过许多贡献，有了许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他领导的老八队，在崇祯大会战前就异军突起，是一支最有纪律、最有战斗力的队伍。崇祯九年高闯王（注）牺牲后，他就被推为闯王。那时开始进入革命低潮，高迎祥旧部或死、或降、或散，只有老八队仍紧紧团结在他周围，但人数已经不多了。到崇祯十一年十月，即小说故事情节开始的时候，李自成正陷于敌人的穷追堵截中。李自成顶住了逆流，勇敢地率领全军将士与优势的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血战。在战场上，他一再拒绝敌人的诱降，严惩了前来劝降的叛徒，表现了宁可战斗死，不愿跪着生的革命气节和大无畏精神。经过南原大战，李自成几乎全军覆没，仅仅剩下十八骑突围出来，潜伏于商洛山中。这里土瘠民贫，人烟稀少，又连年遭受旱灾和兵灾，十分凋敝残破。这种暂时困难，在革命队伍中引起了意见分歧。分歧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当前

注：高闯王，即高迎祥，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属其部下。崇祯九年，高迎祥不幸被俘牺牲，众推自成为闯王，领导义军继续战斗。

的困难和革命前途。李自成作为这支革命队伍的久经考验的领袖，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不灰心，不动摇，立志重振旗鼓，用一切努力去打开新的局面，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他一方面继续在商洛山中操练人马，整顿军纪，征集粮草，打击富豪，赈济饥民，为将来重新树旗作好准备；一方面亲冒风险，奔赴谷城，利用张献忠与明朝的矛盾，劝他迷途知返，约期共举大事，作品通过这一系列事件的生动描写，塑造了一个胸襟开阔、志气恢宏、斗志旺盛、坚韧不拔的农民革命领袖的高大形象。而且通过这一形象表达了深刻的思想，总结了重要经验：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不能被暂时的困难吓倒，不能丧失斗争勇气，不能动摇变节，不能忘记革命的大目标，而要发扬宁折不弯的革命志气，积极地创造条件，勇敢地继续战斗。

随着斗争的深入，李自成的性格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屡经挫折之后，他不断地总结当代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一些经验教训，认真地观察和思考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进入河南后，李自成除了保持过去的优点之外，还以一个很有政治头脑、能灵活运用斗争策略的统帅和农民领袖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李自成》一、二卷，用不容置疑的生活逻辑和令人信服的细节描写，展示了李自成性格成长的历史，写出了他的鲜明的个性，显示了时势造英雄的真理。作者没有把这个英雄写成一个“天才”，他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象太山不择土壤，因而成就了他的高大。对群众的信任和依靠，不仅使李自成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而且使他高出于其他义军头领。在一次誓师会上，

他把保卫商洛山的功劳归于人民群众的支援，这不仅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平等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初步民主思想，而且是他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切身体验，是实践产生的真知。根据历史记载和与历史真实相符合的小说描写，李自成从不自作聪明地哇啦哇啦地发表议论、总是先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然后择善而从，作出决定。他的这种作风，正是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具体表现。

李自成是我国历史上深受人民欢迎的农民领袖，这一点连某些反动历史家也不敢否认。《李自成》不仅用许多动人的情节，写出了人民群众对李自成的热爱和拥护，而且揭示了原因：李自成具有朴素而又强烈的阶级爱憎，对劳苦百姓的深切关怀，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强烈憎恨。他所采取的一些革命措施和提出的一些革命口号、政策，都体现了这种鲜明的爱憎，代表劳苦百姓的利益，打击劳苦百姓的敌人，争取广大劳苦百姓对起义的支持，这就是李自成能在商洛山坚持下来、能在河南打开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李自成的形象闪闪发光的原因。

除了李自成的光辉形象之外，小说还塑造了刘宗敏、李过、袁宗第等英雄形象，特别是塑造了象高夫人、红娘子、慧英、慧梅这样一些古代革命妇女英雄形象。这些农民起义的女英雄不是穆桂英、樊梨花那样传奇式的人物，而是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理想，却又扎根于历史的现实。在历史上，不仅有红娘子的传说，而且高夫人实有其人，同时史料中还有李自成部队中的女兵的记载。有关高夫人的记载虽不多，但李自成牺牲后，她的确曾以皇太后的身份成了这支义军的重要决策人。

当然，小说中关于高夫人和红娘子等人的许多具体情节，是作者根据当时的历史可能性虚构出来的。这种历史可能性是指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空前规模和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在一定程度上给妇女的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随着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产生的初步民主思想，对禁锢妇女的封建思想也有所冲击。在这之前，早就出现过象唐赛儿那样农民女领袖，两百多年后出现高夫人、红娘子这样的女英雄，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反动阵营中有个女将秦良玉，农民起义军中难道就不能有个智勇兼备的高桂英？小说中写出了这些杰出的革命妇女的形象，不仅为中国文学画廊增添了异彩，而且反映了明末农民起义深远的影响，进一步肯定了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

《李自成》描写了一大群男女农民英雄，他们各有各的个性特色，各有各的生活阅历，各有各的活动天地。这些人物形象在艺术上有衬托作用，但决不是作为“铺垫”而存在，而是服从一个总的战斗目标，各人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发挥自己的革命的主动性，建立了不朽的革命功勋。这众多的英雄形象，构成了一幅绚丽壮观的历史画面，充分显示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波澜壮阔的气势，显示了人民群众翻天覆地的巨大威力。如果不从生活出发，不服从主题的需要，去突出宝塔尖上那么一两个人物，让别人都作为他的“铺垫”而存在，这岂不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显而易见，《李自成》的创作实践，把“四人邦”的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三突出创作原则”顶到南墙上了，使它露出了伪科学的真面目。

《李自成》不仅写了一大批起义英雄形象，而且还充分

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表现了英雄与群众关系。商洛山义勇营的踊跃参战，老弱伤病的慷慨请战，老工匠的老而弥壮，野人峪外的饥民助战，这一幕幕动人场景，处处使你感到这股巨大力量的存在和它对时局的推动作用，都使你想到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不止是商洛山，在崤函山中、伏牛山下、河洛平原……也全都是这样。闯王敢于带几个人去平定杆子的哗变，也正是由于他相信石门谷的头领和士兵“愿意随我起义的是大多数”。他把商洛山保卫战胜利归功于人民群众的支援，除了谦虚之外，也的确反映了事实的真相。

这两卷小说描写了许多战争场面，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它和传统小说描写战争的手法并不一样。在那些作品里，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阵前苦斗貔貅将，旗下旁观草木兵。”战争的胜负似乎与士兵全不相干，而取决于“斗将”的结果。显而易见，这种战争描写的指导思想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李自成》描写古代战争，摆脱了这种传统的观念和传统的手法。潼关南原大战的描写，不仅有将领们的特写镜头，而且有士兵群体的动人场面，连杜狗娃这个临时请来的向导，也有出色的描写。写刘宗敏跃马渡汉水，固然传奇色彩甚浓，令读者惊叹不止，但谁也不会忘记，由于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拼死杀掉几个正要放箭的敌人，争取了时间，刘宗敏的精彩表演才没有以悲剧结束。作者这样处理英雄与群众的关系，这样描写战争场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胜利！

作为农民军的死对头，明王朝的主要决策者，小说中着重写了崇祯和杨嗣昌这两个人物。他们象历史上的一切反动

派一样，都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宁可向满清贵族屈膝，决不放松对人民的镇压。表面上“刚毅有为”，实际上色厉内荏，充分暴露了没落阶级的腐朽本质。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腐朽政权，他们殚精竭虑，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他们代表的是一個腐朽没落的阶级，指挥的是一支腐朽透顶的军队，使用的是一群腐朽不堪的官僚，因此他们注定是没有出路的。崇祯愈忙愈乱，愈“刚毅有为”愈举动乖张，愈自作聪明愈显得愚蠢。杨嗣昌也不例外。他明知增加“剿饷”、“练饷”是饮鸩止渴，但为了救燎眉之急，又不得不喝下这杯毒酒；明知跋扈将军左良玉难以驾驭，难得依靠，但又不得不倚重他，平白地将一颗“平贼将军”的大印送给他；明知李自成是明朝的“心腹大患”，却只能派出郑崇俭、丁启睿这样的废物与大名鼎鼎的闯王周旋；明知豫楚空虚，却又不能不集中兵力于四川。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逃不脱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历史规律。

《李自成》的人物形象都塑造得十分精致，即使是反面人物，也力求表现他们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完全摒弃了“四人帮”倡导的漫画化脸谱化的手法，而且各种形象都很富有思想性，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

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生活，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小说创作必须正确处理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关系。在

这方面，作者的经验是：“深入历史，跳出历史”。

明末史料繁多，有的彼此因袭，有的相互矛盾。作者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有关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的科学的考证和分析，“去伪存真”，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深入了历史，如不能跳出历史，就无法完成艺术使命。姚雪垠同志之所以跳得出来，在于他掌握和运用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以高屋建瓴之势驾驭历史题材，反映出历史生活的真实。

首先，作者是根据文艺作品沉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原理来塑造英雄形象的。李自成这个历史人物关于他的不贪财、不好色、生活朴素、作风民主等好品质的记载，官私史籍均无异辞。这是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基础。但作者并未受史实的局限。他把同时代的许多先进人物的优点集中到他的身上，使他比历史上的李自成“更典型，更理想”，而又没有把他写成超时代的英雄，在他的身上仍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这是作者“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成功实践，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在这个形象上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这一实践，对“四人帮”鼓吹的写英雄人物要“高大完美”的谬论，是个有力的批判。

其次，按照“两结合”的原则，作者对历史传说作了必要的加工改造。例如张献忠投降和重新起义问题，官私诸史均有记载。而李自成是否去过谷城，则记载不一；即使可信，一般只能理解为兵败求援。在李去谷城之前，张“已有异志”（见吴伟业：《绥寇纪略》），并非出自李自成的劝说。

小说第一卷从第十六章起，写李自成为了打开新局面，

推动革命高潮，冒着很大风险去谷城劝说张献忠，并约定第二年五月张重新起义，李重新树旗。翌年双方践约，农民运动出现了新局面。小说告诉我们：张献忠重新起义不尽出于内因，也得力于李自成的推动。这样处理，其艺术效果是：显出了李、张高低之差，使张这条线不游离于李自成这条主线之外。同时又符合历史科学：张献忠确实投过降，而李自成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斗争，反对投降，在政治上李比张成熟。

又如杨嗣昌出京督师，威威赫赫，气势非凡。一到襄阳，雷厉风行，还悬出赏格：“活捉张献忠赏银万两，活捉李自成也是赏银万两……”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杨的行辕到处张贴着“没头帖子”：“有斩杨嗣昌首级来献者赏银三钱。”这是多么绝妙的讽刺！大大杀了这个“督师辅臣”的威风，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但是据记载，“没头帖子”一事发生在一年以后的重庆，而不是在襄阳。作者把它移植过来，不仅加强了小说的艺术效果，而且于史事更加合理：张献忠在襄阳一带活动时间长，传说“襄阳城内大小官员和地方巨绅都受了张献忠的贿赂，到处是张献忠的细作和坐探，无从查获”，而一年以后张献忠是被逼入川，立足未稳，在重庆不大可能有这样的心腹和坐探。这样处理，完全符合“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要求。

再是把矛盾加以集中，例如“紫禁城内外”写黄道周因弹劾杨嗣昌而受廷杖，叶廷秀、刘宗周因为替黄说话亦被廷杖和削职，事件发生在几天之内。但历史记载是，黄道周上疏弹劾杨嗣昌是崇祯十一年七月的事，到十三年崇祯加黄以“党邪乱政”的罪名从江西逮捕到京，廷杖八十下狱。六天后，叶廷秀因上书替黄求情，被廷杖一百除名。刘宗周则是